

潘美陷害杨业考辨

闻立鼎

我国五代时期，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将当今山西北部 and 河北北部的要冲之地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贵族政权，致使中原地区失去了天然屏障，构成对中原王朝的严重威胁。为此，北宋初期曾进行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战争，杨业和以他为首的杨家将就是北宋对契丹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在上述战争中，杨业虽然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但却遭到宋朝一些文臣武将的诽谤和陷害，以致最后被逼孤军作战，为敌所擒，绝食而死。实际上他是为自己营垒中的权势人物陷害致死的。陷害杨业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师潘美，一说是潘美与监军王侁等一伙人，也有只提监军王侁，而不提潘美的。

我以为史学界说陷害杨业的权势人物是潘美，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一件历史冤案。潘美是宋朝的开国功臣，一位有名的将领，他在北宋统一和抗辽斗争中都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这样一位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应当把这个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冤案搞清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以期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根据史书记载，陷害杨业的具体事件主要有两起：一、向皇帝潜上谤书诬告杨业；二、在战场上以恶毒手段，迫使杨业陷入绝境，假手敌人，置杨业于死地。本文试就上述两大事件的阴谋策划和参与者，分别谈一些肤浅的意见，以供讨论。

（一）

杨业原为北汉的栋梁大将，北汉亡，他旋即归顺了北宋。他素谙边事，又英勇善战，故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十一月被宋太宗任命为代州（山西代县）刺史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辅助三交兵马都部署潘美，戍卫北边。杨业在边境上，屡挫辽军，特别是太平兴国五年三月，雁门关（山西代县北）一役，出奇制胜，重创敌军，

扭转了当时整个宋辽边境的战局。“杨无敌”的威名越来越高，敌人闻风丧胆。太宗因此对杨业大加褒奖，并加派他为云州（山西大同）观察使。一个北汉降将，竟受皇帝如此之厚遇，自不免引起一些文臣武将的妒忌。《宋史》卷二七二《杨业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指杨业），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有人仅仅根据这段记载便认为妒忌杨业，“向皇帝打报告”说杨业坏话的“主将”，“除了潘美，还会有谁呢？”^①这就断言诬告杨业的主将只能是潘美。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从《杨业列传》这段记载的文字上来分析，其中“多”、“有”、“皆”等措辞，已明确地表明了妒忌杨业的“主将”不止一人，其中有“潜上谤书”的，也不止一人。再则，这段记载既没有说明“主将”一定就是杨业军中的主将，又没有指名道姓点出这些主将到底是些什么人。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断言潘美就是潜上谤书诬告杨业的唯一主将呢？显而易见，这个论断是缺乏根据的。

其次，太平兴国五年在宋辽边境的“戍边主将”多达数十人，如：受诏“与潘美城并州于三交”（今山西太原市）的大将梁迥、平州（河北卢龙）刺史史珪、幽州行营都部署曹翰、关南（河北白洋淀以东一带）兵马都部署崔彦进、镇州兵马钤辖、沧州都部署李汉琼……等等。戍边主将如此之多，怎么能说“事实上所谓主将，除了潘美，还会有谁呢”？这些戍边主将中，有的在攻灭北汉的战役中曾受过伤，如李汉琼“矢集其脑，併中指，伤甚”^②梁迥“中流矢四”^③，而杨业当时作为北汉的大将，曾指挥了这些反抗北宋的战斗；有的主将生性阴狡奸诈，好诬告诽谤别人，如史珪就诬告过知德州梁梦升^④，曹翰“好使气凌人”、“阴狡多智数、好

夸诞。贪冒货赂”，大臣范质曾说他“饰诈而专”^⑥；有的主将在杨业立功的前后，也在戍卫北边的战斗中立了不少功劳，如崔彦进、刘延翰等，曾于太平兴国四年冬，互相配合，取得了满城（河北满城县）大捷，挫败了辽军南京（北京市）留守、燕王韩匡嗣、耶律沙等报复性的南伐，战绩赫赫，“斩首万余级，获马千余匹，俘老幼三万户及兵器军帐甚众”^⑦。上述主将中，受伤者出于仇恨、报复，阴狡者出于本性、恶习，居功者出于负气、嫉妒，均有可能潜上谤书、诬告杨业，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这从常理上讲，不是更说得通一些吗？

杨业之所以遭到朝廷内外一些文臣武将的忌恨，主要在于他是从北汉归降过来的疎外之将，非但杨业自身，连其效忠于宋廷的后代也继续受到这种遭遇，如真宗曾对宰相说：“（杨）嗣及延昭（杨业之子）并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及于此”。^⑧

宋代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对地方官吏的控制，非但鼓励臣僚互相告发弹劾，而且准许他们“风闻弹人”，不一定非要有真凭实据不可，弹奏不当者也不负任何责任，甚至规定御史每月必须奏事一次。如上任百日而无所纠弹则要受处罚^⑨，由此弹人之风大盛。在这种风气下，象杨业这样的疎外之将，被人明弹暗奏，自然非止一次，非止一人了。

那么，在弹奏杨业的人之中，有无潘美的可能呢？考察有关史料，似乎也看不到有这种迹象。杨业自归宋后不久，到雍熙三年（986年）夏陈家谷捐躯，与潘美同事共职六、七年，史书上未有一句关于两人曾有忤悖齟齬之记载。潘美也从无潜上谤书诽谤别人之事实。且在潘、杨共事期间，他们负责处置的边事诸般顺遂，屡见捷报，足以证明两人的协作配合是颇为谐和的，至少也是无多大冲突的。从这种情况看来，很难设想潘美与潜上谤书诬告杨业之事有什么牵连。

所以，在缺乏足够的史料作佐证的情况下，判定潜上谤书诬告杨业的就是潘

美，则未免失之武断。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

北汉原为契丹之臣属国，北汉亡，契丹失去了犄角之势，太宗便发动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战争。雍熙三年初，太宗以辽圣宗年幼，母后肖绰当政，认为是出兵攻辽的良机，便兵分三路，大举北伐。东路军为主力，由曹彬率领，出雄州（河北雄县）攻取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率领，出飞狐口（河北涞源县北），攻取今山西北部地区和河北西北部各地；西路军由潘美率领，杨业相辅，出雁门关，攻取今山西北部各地。结果，东路军曹彬大败。契丹乘胜麾师西指，中路军抵挡不住，西路军也随即败退。太宗见整个北伐计划遭到破坏，大势已去，便急令潘美、杨业的西路军护送寰、朔、云、应四州之民南徙内地。杨业被迫出战，终于被俘牺牲。那么到底是谁陷害杨业，置之于死地的呢？

当时的情况是，契丹军夺回寰州以后，主力逼到雁门关以北，隔断了宋军与云、朔两州守军的联络，形成了隔关与宋西路军正面对垒的形势。当时契丹气势正盛，因此要成功地徙走这数州之民，困难极大，靠硬打硬攻是不能奏效的。杨业当时权衡利弊，提出了一个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计划，但却遭到了太宗亲自派来的监军王侁和刘文裕反对和诬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记载：“……业谓美等曰：‘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监军、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必败之势也。’侁曰：‘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伤

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死耳’。”(引文中之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这段文字清楚地指出了置正确作战方案于不顾，反血口喷人，激逼杨业出战者，不是潘美，而是王侁、刘文裕之流。

《宋史》卷二七四《王侁列传》中也说王侁“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因此，认为潘美诬蔑并激逼杨业出战的说法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杨业为王、刘所逼，只得出兵前往攻打朔州。临行前曾约潘美、王侁在陈家谷口(山西朔县之南)接应，以免全军覆没。但王侁等没有严格履约，使杨业失去接应，终于力竭被擒，绝食而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记载道：“(杨业)将行，……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美即与侁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敌败走，侁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可见玩忽职守，使杨业失去接应陷于契丹的直接罪责应由王侁来承担。事后太宗在贬责潘、王、刘的诏书中也明确指出了他们各自的过失，责潘美为“不能申明斥候谨失隄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①，责王、刘为“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违众任情，彼前我却，失吾骁将，陷此生民”^②。主要责任该由谁负，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宋代皇帝对大臣，特别对武臣，百般猜忌。王夫之曾曰：“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③。为此，宋承唐制，也实行监军制度，用以分将帅之权，防其拥兵自重，从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当时，监军之充任者均为皇帝的亲信人物，其权力很大。如王侁以西上阁门使之职衔，出任并州驻泊都监，又为云应等州兵马都监，监潘美、杨业之军。而东、西上阁门使则“多以处外戚勋贵”^④。王侁是以父任(父朴曾为后周枢密使)而充任此职的，

被太宗视为“早膺任使，久侍轩墀”^⑤的亲贵人物。这样的人担任监军自然足以左右军中主帅。于是，主帅受其掣肘，为其控制，不能自主行事，这也正是符合皇帝的要求的。监军权限之大、地位之尊，甚至有的大臣仅仅因为与监军发生了争执就遭到了贬官的处分^⑥。至于王侁，作为西路军之监军，其权力之大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护民南徙的战斗中，他先是蛮横地沮杨业之议，继而以恶语激逼杨业出战，最后又擅离职守，私自撤军。对这一系列行为，作为主帅的潘美根本就无法也无权制止，难道由此而产生的恶果不应由王侁负责而反要归咎于潘美吗？

历史事实本来已很清楚，然而还是有人以为，因潘美“有个孙女儿^⑦嫁给宋太宗的儿子，后来成为皇后。所以他不但不是大臣，还是国戚。封建时代的历史家对于这样一个大官僚、大贵族的错处，当然是竭力掩饰的，于是便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王侁的身上去了”^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颇为牵强附会的。杨业殉难，潘美受责时，其孙女儿还刚刚被封为莒国夫人，而且在真宗当皇帝之前九年，或真宗被立为太子之前六年，即端拱二年(989年)便死了，死时才二十二岁。她被追封为莊怀皇后(庆历中改谥章怀皇后)是在潘美死后十几年的咸平年间。潘美那时还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国戚，当时的史官何以定要对他有所忌讳呢？其实当时李皇后之父李处耘、郭皇后之父郭守文、曹皇后之祖曹彬等，史书上对其褒贬之词互见，为何唯独要为潘美掩饰呢？再说北宋之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距潘美在世时已有二百年；《宋史》成书于元顺帝至正年间，距潘美在世时更有三百五、六十年了，在这些史书中，封建时代的历史家即使对皇帝也有贬诋之词，何况对潘美这样一个普通国戚呢？

史称潘美生平“好乘怒杀人”^⑨，其部下和人民自然不会对他十分好感。潘美当时是杨业军中之主帅，杨业屈死，潘美立即坐失职而削三任，这就给人们造成了

一种错觉：好象潘美正是陷害杨业的罪魁。而当时和后来的广大人民出于对杨家将的尊崇和同情，故无不切齿于导致杨业屈死的祸首，因而迁怒于潘美，从此潘美便被背上了陷害杨业的黑锅。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又经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的艺术渲染，潘美的形象更被丑化，用来陪衬杨家将的大忠大勇，正象东汉末年的曹操被作为白脸奸臣来陪衬刘备一样。这种文艺上的敷衍和夸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史学界。后人在论及潘美的是非时，往往都只是因袭前人之说，不去认真加以辨析，以讹传讹，遂使潘美近千年来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反面的形象印在了人们的头脑里。这种被歪曲了的历史应当加以纠正。

①⑩ 见沈起炜同志 历史丛书《杨家将》1978年版

② 《宋史》卷260《李汉琼传》

③ 《宋史》卷273《梁迥传》

④ 《宋史》卷273《史珪传》

⑤ 《宋史》卷260《曹翰传》

⑥ 《续资治通鉴》卷10

⑦ 《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⑧ 参见赵希鼎同志《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变迁》一文，载于《历史教学》1979年第四期

⑨ 《宋大诏令集》卷94《责潘美制》

⑩ 《宋大诏令集》卷94《责王侁、刘文裕除名配金、登州制》

⑪ 王夫之《宋论》卷10《高宗》

⑫ 《宋史》卷166《职官六》

⑬ 《宋大诏令集》卷94《责王侁、刘文裕除名配金、登州制》

⑭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初，（柳）开以殿中侍御史知贝州，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

⑮ 据《宋史》卷242《章怀皇后传》云：“真宗章怀皇后，大名人，忠武军节度使美第八女”，而《宋史》卷258《潘美传》却称章怀皇后是潘美之子惟熙的女儿。同一史书而前后相悖，本文採后一说

⑰ 《宋史》卷258《潘美传》附《李超传》

（本文上接第39页）

④⑤⑥⑦⑧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常熟县文管会珍藏手抄本，瞿元锡：《瞿式耜暨邵氏合葬行实》。

⑨⑩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一，《顺情平法疏》，《严诛附党台臣疏》。

⑪⑬⑭⑯ 《明史》卷二百八十，《瞿式耜传》。

⑫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二，《端用人之源疏》。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一，《特表清忠疏》。《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二，《陈时政急着疏》、《亟修战备疏》、《佐边储疏》、《讲求火器疏》、《请苛政疏》。

㉒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瞿式耜传》。

㉓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九，《寄吴尔宁书》。

㉔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三，《请移蹕桂林疏》，《请速幸桂林疏》。

㉕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六，《引咎乞罢疏》。

㉖㉗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四，《请驻全阳疏》、《破敌大获奇功疏》。

㉘㉙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三，《飞报首功疏》。

㉚ 上海市图书馆珍藏手抄本，瞿昌文：《虞山集》卷六，《揭帖》。

㉛ 《明史》卷二百八十，《何腾蛟传》。

㉜㉝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七，《何腾蛟传》。

㉞㉟ 常熟县文管会珍藏手抄本，钱秉铨：《所知录》卷中。

㊱㊲㊳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五，《恢复大捷疏》、《恢复靖州疏》、《奉天大捷疏》。

㊴ 《瞿忠宣公诗文集》卷六，《恢复常宁疏》。

㊵ 以上并见《明史》卷二百八十，《瞿式耜传》；《瞿忠宣公诗文集》卷六，《临难遗表》卷九《浩气吟》。